

「藏」在角色背后

任姝姝

从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算起,当演员快40年,从舞台到银幕再到荧屏,塑造了大大小小数十个角色,但除了演戏和领奖,倪大红很少在公众场合现身,更别提谈自己、说表演。这一次,因为电影《我爱你》,倪大红努力从幕后走到台前。

“常为戒让我走心。”电影上映了,他还在琢磨这个人。电影《我爱你》将镜头对准老年人的情感与生活。倪大红在片中饰演空巢老人常为戒,意外结识了倔强老太李慧如,二人由此发展出一段黄昏恋,枯燥的生活拥有了光彩。经由他的演绎,这个老常看似寻常,又有挺多故事,还十分可爱,成为一个倪大红式的人物。

这当然不是他第一次饰演父亲或者老人。用倪大红自己的话说,因为“长得有点着急”,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,最常演的角色就是长辈,“起步就是父亲,然后是爷爷,要不就是比爷爷还老的长辈”。演老常,倪大红丝毫不敢放松,他清晰记得人物形象在自己内心不断堆积的那种濒临缺氧的感觉。一场大雨孝宴的戏,让倪大红和观众都印象深刻。老常随身携带一条麒麟鞭,每一次挥动鞭子,都推动故事情节。在这个高潮段落,老常手持麒麟鞭,一鞭子抽出去,碰到桌子,又带倒了杯子,玻璃碎片四处飞溅,每一鞭、每一声,仿佛都能震碎人心。老常刚刚失去好友又即将失去爱情的复杂内心,表现为他的每一次挥鞭。这场戏拍了不下3天,到最后,倪大红已经握不住鞭子,几次脱手飞出去。他仿佛听到自己内心的呐喊。

“爱琢磨戏”,是同行对倪大红的的评价。倪大红认为自己是幸运儿,还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,就被谢晋导演“瞧上”,参演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;刚进入当时的中央实验剧院院工,又被北京人艺的林兆华导演“瞧上”,在舞台上“摸爬滚打”,演了好几部戏。他与不同风格的导演合作,在学习中不断锤炼演技,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。无论角色大小,他都不急不躁,老老实实把自己“藏”在角色背后,努力把每一个人物都揣摩到极致。所以,他塑造人物常动作不大、声量也不大,只稍稍一个眼神、细微的表情就富含信息量,能准确刻画出人物的性格、人物之间的关系、此时此地的情境。有点像中国画里的工笔,精、巧、细、密。他可能最怕大特写的演员,所有阅历都“写”在脸上。

39岁时,他在田沁鑫导演的话剧《生死场》中饰演农民“二里半”。在萧红的笔下,这是一个不怎么讨喜的角色。倪大红式的“二里半”,一出场就揣着手、弓着腰,走路拖沓,眼皮耷拉,慢得仿佛时间都在他身上静止了,但一张口,台词里又透出拧巴和张力。他卸掉了夸张的动作和语气,完成了这个独特的人物,一举拿下中国戏剧梅花奖。

47岁时,他在电视剧《大明王朝1566》中出演80多岁的严嵩。在剧中,严嵩冬夜里去见嘉靖,圆凳之下会摆放一个火盆。他记得有一场戏,严嵩一开始没有坐凳子,先弯着腰,再慢慢趴下,看有没有火盆。如果有火盆,说明事情不大。可是严嵩一看,没有火盆,立马就跪下,摘下自己的帽子,放在椅子上。这一趴、一看、一跪、一摘、一放,合情合理又准确到位。

59岁时,他在电视剧《都挺好》中塑造的苏大强,迅速火爆出圈,并摘得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奖。苏大强趴在地板上,蔫蔫地说:“我想喝手磨咖啡。”这成了这个人物的特有标签,还被网友做成了表情包。这个动作,其实是倪大红在现场的即兴发挥,由此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自然而然生成了动作和语言。苏大强产生的巨大流量,让他在意外中反思。担心自己被苏大强“榨干”,失去表演的创造力,他选择在舞台上沉淀自己,出演了话剧《银锭桥》《安魂曲》。因为他始终觉得,只有在舞台,才能加固自己表演的“地基”。

倪大红用角色与观众交朋友。电视剧《乔家大院》中的孙茂才,《北平无战事》中的谢培东,《三国》里的司马懿,《正阳门下小女人》中的蔡全无;电影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里的蒋太医,《罗曼蒂克消亡史》中的王老板,《战狼》中的敏登,《悬崖之上》中的高科长……观众未必都能将这些角色的名字和演员倪大红对得上,但这些人物的形象鲜活独特,让人过目难忘。

“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而我这一生都在准备着,观察、阅读、沉淀自己。”63岁了,倪大红仍在攀登。



图为电影《我爱你》剧照。 联瑞影业供图

是,多吉也曾是一名电影放映员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,西藏山南地区开办过一批“赤脚放映员”培训班,招收了30多人,20岁的多吉是其中一员。那时,他在洛林乡、哲巴沟附近放映电影,还负责维修放映机、发电机和粘接胶片。“电影胶片经常断裂,我需要把坏的剪掉,再拼接粘好。”经过勤学苦练,多吉可以在2—3分钟内就将故障排除。

“有的农牧民群众走10公里的山路来看电影。”多吉回忆说,“《渡江侦察记》等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很受欢迎。”他们用脚踏式发电机,放一次电影就是两个多小时,1米多宽的架子,两个人同时用脚踏,才稍微轻松些。放电影遇到过危险。翻越大山,蹚过大河,如果大水把路冲坏了,只能等待救援。最长的一次,多吉等了3天。发电机有80多公斤,放映机有30多公斤,下乡时,电影放映机和发电机要靠牦牛和马等牲畜来驮,“最担心马受惊摔坏了机器”。多吉到山南地区换片子,每月至少跑两三次,途中还要翻过海拔近5000米的布丹拉山。夏天蹚水而过,路不好走,但他始终觉得“自己很幸运”。

多吉走上科研之路,与电影放映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第一次青藏科考期间,有五名科考队员住在加查县礼堂边上。“当时能到县里看电影,就是最好的娱乐。”多吉由此结识了青藏科考的成员。科考队的工作让多吉第一次有了地质的概念,并被他们踏遍千山万水为祖国建设“寻宝”的精神和事迹深深鼓舞。1974年,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,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,多吉和20多名藏族年轻人被推荐到千里之外的成都地质学院(现为成都理工大学)读书。由此,他转换到另一条人生赛道。

和电影放映相比,地质工作更加艰苦。到偏远高山荒漠、大河险滩时,多吉时常回忆起在电影放映的时光。离开电影放映岗位多年,他依然牵挂着老队友们。1991年到1992年,多吉用自己的“手艺”帮地矿部羊八井地质大队放电影。在成都工作时,他也客串过电影放映员。

小小银幕见证山乡巨变

普姆村距离加查县城大约8公里,全村有36户、137人。“以前村里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,每次放电影的场地就是村里的打麦场,现在有了能放电影的文化活动室。”再次见面,见参和队员们把电影带到了普姆村。见参的放映队有一辆皮卡车,6个座位,正好每位放映队员一人一座。还要带上银幕、发电机、放映机、音箱等设备。距离县城10公里以内的短途放映任务,队员们集体出动。

见到见参的皮卡车开进村委会的院子,村民们就主动帮着抬音箱、搬设备、挂幕布,不一会儿,放映准备工作就全部完成。“放映队是村里的常客,每年都要来许多趟。赶上虫草采挖季,他们会带上发电机,在放映点住两个月。电影带来致富的信息,也开阔了村民的眼界。”因为电影,普姆村党支部书记格桑顿珠与见参相识多年。

调试好音响,电影就从数字电影播放设备和数字电影发展介绍开场。村民们陆续走进屋内,5排藏式沙发被40多名观众坐满。

“油灯并不是唯一能带来光明的东西,还有电,还有好看的电影……”正在放映的是《西藏天空》。这是一部反映西藏近代风云的历史片。熟悉的地理风貌,精彩紧凑的情节,迅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,两个小时转瞬即逝,没有人来回走动,也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场。

“村民对电影的喜爱,就是我们工作的最大动力。”放映结束,队员扎西次仁一边收拾设备,一边感慨这次放映的“火爆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,为了多带一些胶片到村里放映,扎西次仁买了辆自行车。1998年,扎西次仁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,方便了很多,但路还是土路。“无论是开拖拉机,还是骑自行车,只能慢慢地开、慢慢地骑,因为害怕把设备弄坏。”2015年,扎西次仁的家里买了私家车,他会开着私家车去放映点。

现在大家看电影的渠道更多了。目前,加查县城里的数码影院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在一个大楼里,硬件设施不亚于大城市里的影院。从2010年起,放映队的人就开始了少了,去年两位队员退休,如今,只剩下4个人。让见参和队员欣慰的是,放映队始终有自己的观众群:“只要有一个观众,电影就要坚持下去。”

行走半个多世纪,年放映超过888场,西藏加查县电影放映队——

“世界屋脊”上的“星空电影院”

袁泉 琼达卓嘎



核心阅读

半个多世纪以来,一代代放映队员行走在“世界屋脊”的高山大河间,克服高寒缺氧、山高路险等困难,为雪域高原上的人们讲述光影传奇。直到今天,西藏有478个乡镇(镇)数字电影流动放映队,加查县电影放映队就是其中之一。

加查县电影放映队每年的任务是放映888场,但放映队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,2021年放了900多场,观众超过了1.9万人次。对放映队员来说,电影放映的场次并不是单纯的数字,更是一份责任。



图1:夜幕降临,西藏山南市加查县的山谷里正在放映电影《湄公河行动》。 赵朗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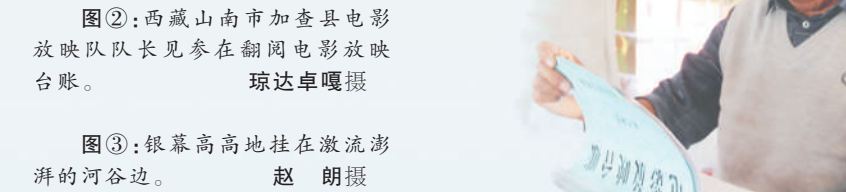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2:西藏山南市加查县电影放映队队长见参在翻阅电影放映台账。 琼达卓嘎摄



图3:银幕高高地挂在激流澎湃的河谷边。 赵朗摄

版式设计:赵德汝

富,看电影不再是唯一的选择。”见参高兴之余又有几分失落,“以前,哪怕下大雪,村民们也会要求看电影。”

在西藏,四五月见到漫天飞雪并不稀奇。一到下雪天,人们不能上山,晚上看电影的人就会多起来。下雪的时候一般放两场,不下雪的时候只放一场。观众的多与少,全看电影受欢迎程度以及村民当天劳作情况,当然,这也是见参职业成就感的来源。

“观众在哪里,电影就放映到哪里。”只要有观众,见参每晚都会准时把露天银幕搭建好。“从前要提前一个小时架设备,如今一台机器连上电,就可以放映了。”工作40余年,电影放映机从8.75毫米到16毫米再到35毫米,最后是数字电影放映机,他见证了乡村电影事业的发展。

见参最喜欢听的,就是观众们喊“再放一个!再放一个!”加查县电影放映队每年的任务是放映888场,但放映队每年都超额完成任务,2021年放了900多场,观众超过了1.9万人次。对放映队员来说,电影放映的场次并不是单纯的数字,更是一份责任。

无论故事片还是科教片,这里的人们都喜欢看

加查县电影放映队有6人,都是年届花甲的老兄弟。嘉措曾是放映队的骨干,经常上到海拔4800多米的牧区放电影。常年奔波让他患上了类风湿,膝关节变形严重,但他依然怀念放电影的日子。“那时候用马匹驮设备,最远的地方有60公里,足足要走上一整天。放映队自己背着粮食,自己做饭,3个石头垒个灶,煮个茶,就着糌粑,就是一顿饭。”嘉措分管的片区有18个放映点,从1978年开始,他硬凭着人背马驮,保证每个月都能到每个点上放电影。

“电影拷贝胶片放在铁盒子里,重得很,一个人最多背3个。每次放映都要背七八个拷贝胶片。”见参印象里,最重的是发电机。“1101发电机差不多是一个人的重量,需要两个人轮流背,才能背得动。”

“现在,采挖点通上了电,手机也有了网络,大家在这里生活更方便,娱乐方式也更丰

富,看电影不再是唯一的选择。”见参高兴之余又有几分失落,“以前,哪怕下大雪,村民们也会要求看电影。”

大家的零散回忆,还原出一个个温馨的画面。发电机坏了,村民们会一直等,哪怕等到晚上12点。有的村民干脆帮着一起修发电机。但如果扩音器坏了,他们就会非常失望,一遍遍地询问下次啥时再来。只要有放电影的消息,大家就奔走相告,呼朋唤友,村里像过节一样热闹。见到放映队员来了,人们都会准备青稞酒、煮鸡蛋,好吃的东西都会拿出来。

放电影差点让嘉措丢了命。1993年10月,翻越雪山去崔久乡放电影,嘉措带着被子骑在马上,另一头牦牛驮着电影机。一场暴雪突然而至,雪没过了腿,嘉措被困了5个小时,人们找到他的时候,天已经黑了。“当时感觉腿烧得疼,其实就是被冻伤了。”嘉措一心想着不能耽误放映任务,硬是让村民们把自己抱到电影机旁,坚持到放映完。遇险之后的3年,嘉措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。

2000年以后,发电机质量变好了,放映机也就很少出现故障。2005年后,加查县的乡镇陆续通了电。到了2015年,放映队基本上不再为发电发愁。

“现在,交通出行条件大为改善,除了大部分通村路还是土路,从县里到每个乡都有柏油路。”见参说,从他家所在的加查镇到最远的放映点坝乡秋巴村有114公里的路,柏油路占70%,土路占30%,有的路段海拔在4500米以上。

如今,手机、网络逐渐走进了高原。“信息渠道越来越广,我们会选择一些居住比较集中的村子放电影。”无论故事片还是科教片,这里的人们都喜欢看,而西藏题材的故事片,更容易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。见参拿出一张存储卡:“这里面可以存20部影片,战争片、爱情片、科幻片应有尽有,这在过去根本想不到。”

放映队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位藏族院士

从农奴的儿子到国际知名地热专家,多吉是新中国第一位藏族院士。鲜为人知的